

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所见 苏毗与吐蕃关系史事^①

杨 铭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敦煌、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与相关的汉文文献，深入地探讨了有关唐代吐蕃与苏毗关系中的若干史事，内容涉及吐蕃对苏毗的征服与军政建制、苏毗王子悉诺逻奔唐事件、中晚唐敦煌和西域的苏毗人等，进一步揭示了隋唐时期苏毗在西北的分布、活动及其融合于吐蕃的轨迹。

关键词：吐蕃 苏毗 悉诺逻 孙波 孙波茹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1）03—0026—07

苏毗是很早以来就活动于西域的一个古老的民族，新疆南部地区出土的隋唐之前的佉卢文书称苏毗为 *supiya*，敦煌、新疆南部地区出土的古藏文文献作 *sum po* 或 *sum pa*，由于古汉语没有读 *sum* 的字，故汉文文献译作“苏毗”或“孙波”。^②

吐蕃与苏毗的关系是从传说中的聂赤赞普之世开始的。《贤者喜宴》记载，聂赤赞普曾令蔡木田吉木嘉征服了苏毗派苯教师卧雍杰瓦（*ho yong rgyal ba*）。在其后的吐蕃“天赤七王”时期，苏毗流行的宗教——苯教（*bon po*）逐渐形成为一个教派，称为“孙波苯波”（*sum po bon po*）。《贤者喜宴》还说，赞普仲年代如于苏毗域（*sum pavi yul*）与一苯教徒之妻名贾莫贾江（*rgya mo rgya lcam*）生有一子，名叫松日仁布（*sum ri ring po*），是吐蕃王朝第31代赞普达日年塞的异母长兄。^③到公元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吐蕃与苏毗双方在宗教、文化诸领域内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吐蕃悉补野王朝经过达日年塞、囊日伦赞和松赞干布三代赞普的努力，

① 本文为西南民族大学2011年历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建设项目（编号：2011XWD-S06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② 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苏毗》，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0~21页；佐藤长《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上卷，同朋舍，1977年，第139~140页；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637页。黄盛璋提出唐代西域地名“萨毗”亦来源于 *sum pa*，而笔者认为“萨毗”应是“鲜卑”的古音* *saibi*，故不采。见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杨铭《藏文史料中关于萨毗的记载》，《西北史地》1993年第4期。

③ 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59、170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张怡荪主编《汉藏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92页。

最终完成了对苏毗的统一。

一、吐蕃统一苏毗与军政建制

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苏毗被吐蕃征服之前是青藏高原上众多的小邦之一。《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P. T. 1286) 内记 “在各个小邦境内，遍布一个个堡垒，任小邦之王与小邦家臣者，其历史如下：……苏毗 (sum yul) 之雅松之地，以末计芒茹帝 (vbal lje mang ru ti) 为王，其家臣为‘朗’ (rlang) 与‘康’ (kam) 二氏。”^①

据《贤者喜宴》记载，苏毗可能是在赞普仲年代如时被吐蕃征服的。^②之后，到松赞干布登基之初，羊同与苏毗旧部趁机发动叛乱，《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说 “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外戚如象雄、犏牛苏毗……等公开叛变。”但这次苏毗的叛乱并没有成功，先是羊同乘机占领了苏毗旧地，不久松赞干布在苏毗领地杀死了羊同国王李木嘉，苏毗很快被吐蕃收复。正如“赞普传记”所说 “娘·芒布杰尚囊对苏毗一切部落不用发兵征讨，有如种羊领群之方法，以舌剑唇枪服之。不损失户数，悉归真正之编氓矣。”后来，通过噶尔·钦陵之口又道出了苏毗这次因为叛乱而被镇压的事件，其曰 “吐蕃之神圣赞普，与苍天二者共同笼罩之下，大无过于末·计芒，他深藏于九层地表之下，擒而杀之。”^③

《新唐书·苏毗传》说 “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东与多弥接，西距鹵莽硖，户三万。”反映的就是苏毗刚被吐蕃征服时的国情与地理位置，大致是在今金沙江上游通天河以西，跨唐古拉山之地，西至今青海索曲北源上游，北达吐谷浑以黄河相邻的地理范围内。^④

吐蕃历代赞普对归附的原苏毗贵族亦予以重用，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所载，活动于8世纪中叶的“末·东则布”就是出身于苏毗的王族成员，官至吐蕃大相；^⑤写于公元815年的《噶琼多吉英寺崇佛誓约》记载，参与“崇佛誓约”的有“末氏·论没庐玛” (vbal blon vbro ma)；公元823年立于逻些（今拉萨）的《唐蕃会盟碑》所载的吐蕃高官中有“岸奔木盍苏户属劫罗末论矩立藏名摩” (mngan pon khab so vo chog gi bla vbal blon klu bzang myes rma)，^⑥此人显然也出于苏毗。

自被吐蕃征服以后，苏毗成了吐蕃军政建制中的一部分，称“孙波茹”，其中包括被吐蕃征

① 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41~142、173页。

② 有关吐蕃征服的九曲流域的“森波杰”是否就是苏毗，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杨正刚持肯定的态度，而巴桑旺堆、林冠群则认为两者根本就是地域不同、名称不同的被吐蕃征服的两个小邦。对此争论，笔者倾向于后者的意见。见巴桑旺堆 《有关吐蕃史研究中几个“定论”的质疑》，《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林冠群 《苏毗与森波杰考辨》，《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291~317页。

③ 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28、140、159、172页。

④ 杨正刚 《苏毗初探（一）》，《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周伟洲 《苏毗与女国》，《大陆杂志》第92卷4期（1996年），收于同作者 《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⑤ 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08~109、154~155页 “末·东则布” (vbal ldong tsab) 在“赞普传记”中拼作“末·杰桑东则布” (vbal skye zang ldong tshab)。

⑥ 巴卧·祖拉陈瓦 《贤者喜宴》，第412页；黄颢 《〈贤者喜宴〉摘译》（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王尧编著 《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服的汉人,共编成11个东岱,分布范围大致为唐古拉山南北的广大草原。^①《贤者喜宴》记其范围是“东至聂域朋纳(guye yol bum nag),南至弥地曲纳(Smri ti chu nag),西至叶晓丁波切(yel zhabs sding po che),北至纳雪斯柴(nags shod gzi vphrd),以仓甲雪达巴园(chang rgya shod stag pa tsal)为中心。”^②此四至的地望,据日本学者佐藤长研究,孙波茹的中心“仓甲雪达巴园”在今边坝以西的丹达塘,东至的“聂域朋纳”在今昂曲(噶木楚河)中下游,西界的“叶晓丁波切”在今札嘉藏布间北侧之叶尔诺札湖,北至的“纳雪斯柴”在今唐古拉山以北尕尔曲南雁石坪一带,南界之“弥地曲纳”在今黑河嘉黎县境麦地藏布。^③可见,藏文文献关于“孙波茹”的分布与《新唐书·苏毗传》所记之苏毗疆界大致是吻合的。

除了将苏毗部落编入“茹一东岱”制度之外,吐蕃还按照自身的位阶制度授予苏毗各级官吏以不同的告身,《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108条记载“及至猪年(肃宗乾元二年,己亥,公元759年——引者)夏,赞普牙帐驻于堆之阔地,多思麻之夏季会盟由论绮力思扎、论多热二人于伍茹之‘列尔’召集之。孙波茹(sum ru)大部授予告身诏令。”^④另据《贤者喜宴》记载,吐蕃还把苏毗小邦王称为“苏毗铁王”(sum pa leags rgyal),把泥婆罗王称为“铜王”等,“这些即所谓四方面王,他们收集赋税上献,因此,他们亦隶属于属民之中。”^⑤这些内容反映出吐蕃与被征服的各小邦在经济上的联系。

在职官制度上,吐蕃对苏毗采取直接派官进行控制的办法,苏毗王族成员可以任到吐蕃大论之职。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103条记载“及至猪年(玄宗天宝六年,丁亥,公元747年——引者)夏,赞普驻于那玛,廓州(gog yul)一带出现唐人斥候军兵。……冬季大会,于‘碴之寨卓’由大论穷桑、末·东则布(vbal ldong tsab)、论莽布支、尚没陵赞等人召集议盟,牧场大料集之尾数扫清。”“末·东则布”就是出身于苏毗的王族成员。^⑥

相应的,苏毗要对吐蕃王室承担聚集粮草兵马、贡赋纳税的任务,《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692年条提到:吐蕃王室征收“苏毗”(sum pa)是年之“关卡税”,702年条提到是年征“孙波茹”(sum ru)之“大料集”。^⑦《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条记,天宝十四载(755年)正月,苏毗王没陵赞及其子悉诺逻欲率众归唐,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云“苏毗一番,最近河北,吐泽(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军粮兵马,半出其中。”哥舒翰是这次苏毗王奔唐事件的主要经历者,上述内容应是据苏毗人所告而转奏朝廷的,基本符合事实。

① 《贤者喜宴》记载“孙波茹”包括通颊在内的11个千户的名称是:七屯(rtse mthon)千户,博屯(pho mthon)千户,上、下郭仓(rgod tshang)千户,上、下炯(vjong)千户,上、下支(dre)千户,喀若(kha ro)千户,卡桑(kha zangs)千户,那雪(nag shod)小千户。见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187页;部落的译名参见《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270~272页。

② 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186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③ 见佐藤长:《チベット历史地理研究》,岩波书店,1978年,第354~355页;杨正刚《苏毗初探(一)》《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

④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10、155页。

⑤ 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188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⑥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08~109、154~155页。

⑦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98、148页;第99、149页。

看来，苏毗确实是吐蕃对外拓展的重要“军粮兵马”供给地。

二、苏毗王子悉诺逻奔唐事件

天宝十四载，发生了苏毗王没陵赞及其子悉诺逻叛蕃归唐的事件。关于此事件，《新唐书·苏毗传》记载“天宝中，王没陵赞欲举国内附，为吐蕃所杀，子悉诺逻率首领奔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护送阙下，玄宗厚礼之。”《册府元龟·将帅部》亦言“天宝十三载（754年），吐谷浑苏毗王款塞。”《册府元龟校记》“大事年表”记载，天宝十四载（755年）正月，“吐蕃苏毗王子悉诺逻率首领数十人来降”。

对于此次事件，《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755年条是这样记载的“以兵力捕杀谋害父王之元凶……迁出末氏、朗氏之奴户，令二人偿命。”756年条言“清查末氏、朗氏财产之尾数。”^①吐蕃碑铭《达札路恭盟誓之诏书》也记载了这次事件的一些梗概“弃隶缩赞赞普之时，恩兰·达札路恭忠诚业绩卓著，时，末·东则布（vbal ldong tsab）、朗迈色正任大相，忽生叛逆之心，由是，父王弃隶缩赞被害，宾天王子赤松德赞政躬亦濒危境，蕃域黔首庶政大乱。斯时，路恭乃将末·东则布与朗·迈色叛逆事实启奏王子赞普赤松德赞圣聪。末氏、朗氏叛乱劣迹确乎属实，遂将彼等治罪。”^②

据此可知，754年至755年春夏之际，以苏毗王室后裔的末氏和朗氏为首弑杀了弃隶缩赞赞普，率众归唐。由于事情败露，除了没陵赞之子悉诺逻等数十人得以逃脱外，苏毗两千余人均被吐蕃王室捕杀。^③对照以上汉、藏文献的记载，有学者提出藏文文献中的“末·东则布”就是汉籍中的“没陵赞”。^④而笔者倾向于认为“末·东则布”与“没陵赞”并非同一个人，后者可能是驻防于青海的另一苏毗王族成员，当身处险境的“末·东则布”因谋反被杀后，驻防于外的“没陵赞”方有机会欲率众归唐。此“没陵赞”与前面提到的天宝六年（747年）曾与“末·东则布”一起召集议盟的“尚没陵赞”同名，他们有可能才是同一个人。

此外，汉文史料尚载有一些有关这次苏毗王子附唐的细节。《新唐书·吐蕃传》中言“哥舒翰破洪济、大莫门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县，实天宝十二载。于是置神策军于临洮西、洮河郡于积石西及宛秀军以实河曲。后二年，苏毗王子悉诺逻来降，封怀义王，赐李氏。苏毗，强部也。”哥舒翰《奏苏毗王子悉诺逻降附状》载记“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泽（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军粮兵马，半出其中，自没陵赞送款事彰，家族遇害，二千余人，悉其种落，皆为猜阻。今此王子，又复归降，临行事泄，还遭掩袭，一千余人，悉被诛夷，犹独与左右苦战获免。且吐蕃、苏毗，互相屠戮，心腹自溃，灭亡可期，但其王逆归仁，则是国家盛事。伏望宣付史馆，旌其慕化。”《新唐书·王思礼传》记载“王思礼，高丽人，入居营州。父为朔方军将。思礼习战斗，从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同籍麾下。翰为陇右节度使，思礼与中

①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16、173页。

②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第84页。

③ 从《册府元龟》卷九七七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所奏“自没陵赞[赞]送事彰，家族遇害二千余人”得知，以末·东则布家族为首参与这次事件的两千余苏毗人被杀。

④ 宗喀·杨正刚布《苏毗与吐蕃及其他邻近政权的关系》，《西藏研究》1992年第3期。

郎将周倬事翰，以功授右卫将军、关西兵马使。……天宝十三载，吐谷浑苏毗王款附，诏翰至磨环川应接。”《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陕西九临洮府”曰“磨环川在卫西。唐天宝十三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西关磨环川，于其地置神策军。宋祁云：军置于洮州西磨环川也。《会要》云：时置洮阳郡于此。又于郡内置神策军，去临洮郡二百里。至德中，沦于吐蕃。”今人唐耕耦著《唐代交通图考》，考辨诸种史籍认为：天宝十二载（753年），哥舒翰收吐蕃黄河九曲，明年分其地东南境置洮阳郡及神策军于磨环川。郡在洮水之北，军在洮水之南，约今西仓、新寺地区，东经 $102^{\circ}30'$ ，此岷洮道西通洮阳神策军，又西至黄河九曲吐蕃大莫门城，是亦西通吐蕃之一道。^①苏毗王子款附唐朝，选择东至磨环川与哥舒翰会合，应该说当时苏毗族人就在青海省境内的黄河以南地区活动，这与前述河（黄河）北吐谷浑、河南即苏毗的分析相吻合。

天宝十四载归唐后的苏毗王子此后再无音讯。而《顿悟大乘正理决》记载，有“僧苏毗王嗣子须伽提”与汉僧大禅师摩诃衍在逻些相见，法国学者戴密微推测此人就是归唐的苏毗王子悉诺逻。但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僧苏毗王嗣子须伽提”是公元8世纪下半叶的792年前后在逻些与摩诃衍相见的，很难想象归唐的苏毗王子后来又重返吐蕃，或像戴密微推测的那样在吐蕃攻陷陇右时重新被俘，因此，这种出现的时间、地点以致背景都不相同的两个苏毗王子不大可能是同一个人。^②

三、中晚唐敦煌、西域的苏毗人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先后占据了河陇及西域天山以南广大地区，于是征调包括苏毗在内各个茹的部落，分别驻守于今青海北部、河西走廊及天山以南等地，时间长约百年之久。这样，有一批苏毗人分别迁驻于上述地区，这从敦煌发现的藏文卷子及新疆出土的吐蕃简牍中得到了证实。P. T. 1080《比丘尼为养女事诉状》言“往昔，兔年于蕃苏（bod sum）部落与吐谷浑（va zha）部落附近，多人饥寒交迫，行将待毙……”；P. T. 1083《禁止抄掠汉户沙州女子牒》言“亥年春，大论于陇州军帐会议上用印颁发之告牒：兹据唐人二部落使秉称‘此前，沙州汉户女子每为蕃苏（bod sum）部落及个别尚论以婚配为名，抄掠而去，（实则）多沦为奴婢。凡已属赞普之子民均已向上峰呈报，不得随意抄掠。应如通颊之子女，不予别部婚配，而允于部落内部婚配。’”^③以上文书提到“蕃苏部落”、“沙州汉户女子每为蕃苏部落”抄掠等，反映出吐蕃统治时期苏毗人的部落曾经入住敦煌，因其已经高度“吐蕃化”而被称为“蕃苏”部落，说明他们当时处于统治者的地位。^④

前面说过，苏毗的王族姓“末氏”（vbal），而我们在出自敦煌的古藏文文献中，就发现了有苏毗“末氏”（vbal）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任职的情况。P. T. 1089号文书，被法国的拉露女士称

① 唐耕耦《唐代交通图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第549～550页。

② 戴密微著；耿升译《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9页；张广达《唐代禅宗传入吐蕃与有关的敦煌文书》，《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9～200页。

③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48、51～52页。

④ 有学者认为：bod sum应译作“蕃苏”部落，意为“蕃化了的苏毗人”，其地位及任职序列均在后为吐蕃征服的吐谷浑人之上，基本与吐蕃人平等，见杨正刚《苏毗初探（一）》，《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

作《公元8世纪大蕃官吏诉请状》，它于公元9世纪20年代在敦煌被编成，其中提到有苏毗人“末·塔玛腊”（vbal dra ma legs）任沙州“小节儿”（rtse rje chungu）兼“州内守备长”（dgra blon go cu rub），^①这一记载与前引P. T. 1080《比丘尼为养女事诉状》、P. T. 1083《禁止抄掠汉户沙州女子牒》提到沙州及其附近驻有“蕃苏”部落的情况可以互相印证，说明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确实驻有出自苏毗的部落。

P. T. 1089号文书中的一段文字，还记载了吐蕃凉州节度衙（mkhar tsan khrom，其中的khrom又译“节度使”）的情况，这个节度衙下属的几个千户中，就有吐蕃化的苏毗千户。约在公元9世纪20年代，这个节度衙内因官位之争，发生了各族官吏间的纠纷，对此，吐蕃当局曾进行过一些调整，经过调整后的各族千户官吏序列如下：“蕃苏之千户长，通颊与吐谷浑之千户长。……蕃苏之小千户长，……通颊与吐谷浑之小千户长。”^②可见在吐蕃凉州节度衙内，吐蕃化的苏毗人的地位较高，通颊、吐谷浑次之，它反映出苏毗人在整个吐蕃统治体系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事实。这些藏文文书反映了苏毗部落被征调至河陇地区长期驻守，以后就留居于该地区的情况。

又，在今新疆米兰吐蕃古戍堡遗址及和田河上的麻扎塔格等地出土了一批8~9世纪的古藏文文书，在这些文书中记载了一些驻防该地的苏毗属下的部落，如上、下郭仓、七屯、那雪等。譬如有简牍记载“把箭、弓、箭袋、刀、盾交与‘下郭仓’（rgod tshang）部落之纲木鲁贝……”；“下郭仓部落，箭、弓……腰带、盔甲、铠甲（交来）”；“七屯（rtse vthon）部落的托古芒杰从朗赤勒处借得小麦和大麦各半克。偿还的时间定于蛇年仲秋月之二十日，地点为大罗布”；“……上部等地之田一突，其中半突由悉诺穷耕种，那雪（nag shod）部落……两突地，内有茹本农田一突和零星地一突。为军帐长官耕种。”^③

出自麻扎塔格的古藏文《斥候名单残卷》第2行提到了两个吐蕃人（bod nyis）和两个于阗人（li nyis）被安置在通颊（mthong rtse），第4、5行提到了一个出自苏毗（sum pa）族的巡吏（tshugs pon），此人名叫牙莫孙（gya mog seng）。^④同出于此地的另一件古藏文写卷《某庄园呈塔桑阁下书》，正面是来自六个庄园面呈塔桑阁下的请愿书，主要内容涉及从羌若（skyang ro）送来三袋又十一捆什物以及这个传令兵的身份，还提到了一个被称为“纳”（nag）的地方，一个属于“吐火罗”（phod kar）的标记，四个士兵的粮食标准等；背面为一件不同内容的文书，提到了于阗僧（vu ten bande）洛桑勒的一位男性亲属，叫苏毗萨勒（sum pa gsas slebs），被送往尚论处接受审查。另一件古藏文写本也记有苏毗的人名，此人叫做“苏毗人班卓”（sum pa pang kro）。^⑤

① 山口瑞凤《沙州汉人による吐蕃二军团の成立とmkhar tsan军团の位置》，《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施設研究紀要》第4号（1980年），第25~27页。

② M. Lalou, *Revendications des Fonctionnaires du Grend Tibet au VIIIe Siècle*, Journal Asiatique, CCXLIII, 1955, 1~4 (2), p. 177.

③ 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0、47、55页。T. Takeuchi,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p. 189.

④ T. Takeuchi,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p. 15, no. 47.

⑤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 Documents, London, 1951, p. 241; T. Takeuchi,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p. 51, no. 153; p. 68, no. 207.

值得一提的是,吐蕃对河陇的统治结束之后,苏毗仍然活动于从新疆南部到河西走廊一带。据著名的《钢和泰藏卷》记载,公元925年于阗王李圣天派使团前往沙州,其中的首领便是出自苏毗的“末·颊心”(vbal rgyal sum),此人仍然被冠以“大论”的头衔。该文书的古藏文呈请书(草稿1~23行)说“于阗国之臣(yvu then gyi vbangs)末·颊心(vbal rgyal sum)与我等全体使臣谨察请于太保王驾前:若不向人间之王大保呈请,就别无他处可求。我等微末贱臣去年被派作使臣由于阗分两次前来。末·颊心、守夏里(su sha li)、夏都(sha vdu)主仆四人从于阗启程先行。(途中发现敌人足迹,改从新路)上司拨给骆驼两峰于途中死去,(我等)仅能活命来到人主太保之前。此后韩新佳(ham cin ca)、毕都督(vbye tu tu)、赵都督(co tu tu)向我主狮子王呈请,一到沙州,即向君主(太保)禀报,恳请再次派后备(使者)从狮子王……,此次去后未获成功,只能另想他法。”^①

《钢和泰藏卷》的于阗文呈请书第二段(7~24行)所记内容可与古藏文呈请书互补“狮子王尉迟娑缚婆(viśa'sambhata)十四年,鸡年,十月十二日。这个呈请书是由在沙州的使臣们:论·颊心(bulunā rrgyaḍā sūmā)与唐古特(ttāgutta)地方的太守Ṣarnādattā,于阗Hvaṃna地方的太守Ṣaṃdū,和Naṃpa jamñai地方的太守Ṣvāṃnakai共同起草的,所有这些人都了解这些城镇。”^②以上使团为首者的于阗文拼法bulunā rrgyaḍā sūmā(“论·颊心”),在该呈请书的第35行又写作baḍā rrgyaḍā sūmā,后者相当于古藏文的vbal rgyal sum(“末·颊心”),他显然是一个出自苏毗王族的人。以前托马斯等错误地认为vbal相当于古藏文中的bal(泥婆罗),故认为此人似为原住泥婆罗之吐蕃人,后又在于阗供职,为李圣天所信任,六次出使沙州,第七次仍由他率领第一批先行启程。^③对此,贝利已经指出宁愿将vbal看成是一个吐蕃人的姓氏。^④尽管贝利没有指出“末”(vbal)氏源出苏毗,但如上所述,唐末五代的苏毗已经高度“吐蕃化”,将其称为吐蕃人已能接受。通过对以上《钢和泰藏卷》记载情况的讨论,使我们确知9世纪中叶吐蕃对河陇的统治结束之后,苏毗人还继续在于阗活动,而且其势力与影响尚存,这与该族长期在西域活动的历史不无关系。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责任编辑:陈霞

责任校对:王文洲

① F. W. Thomas, & S. Konow, *Two Medieval Documents from Tun - huang*, Oslo Ethnografiske Museums Skrifter, 3.3, 1929, pp. 122 - 130; 黄盛璋:《钢和泰藏卷与西北史地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② H. W. Bailey, *The Staël - Holstein Miscellany*, Asia Major, A British Journal of Far Eastern Studies, New Series vol. II part I, 1951, pp. 2、8、44.

③ F. W. Thomas, & S. Konow. *Two Medieval Documents from Tun - huang*, Oslo Ethnografiske Museums Skrifter, 3.3, 1929, pp. 122 - 130; 黄盛璋:《钢和泰藏卷与西北史地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④ H. W. Bailey, *The Staël - Holstein Miscellany*, Asia Major, A British Journal of Far Eastern Studies, New Series vol. II part I, 1951, pp. 3、8、23、44.